

秋灯忆语：“张家大弟”张宗和  
的战时绝恋

## 序：

为《秋灯忆语》而写的几句话

早在六十八年前，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死”的时候，我的妈咪就溘然离开了我们。一年后，爸爸在安徽立煌古碑冲教教书，课余闲暇时，写了这本小册子，取名《秋灯忆语》，以此纪念我二十五岁就离世的母亲以及他俩在一起的那段刻骨铭心、催人泪下的日子。书写好后，由于当时地方小，印刷条件和纸张都很差，用草粉纸印了约百本，分送给各地亲朋好友，也没有发表。

“文革”把我家造得天翻地覆，所有的字及相片均被抄走，劫后还回一部分，但大部分业已荡然无存，其中就包括《秋灯忆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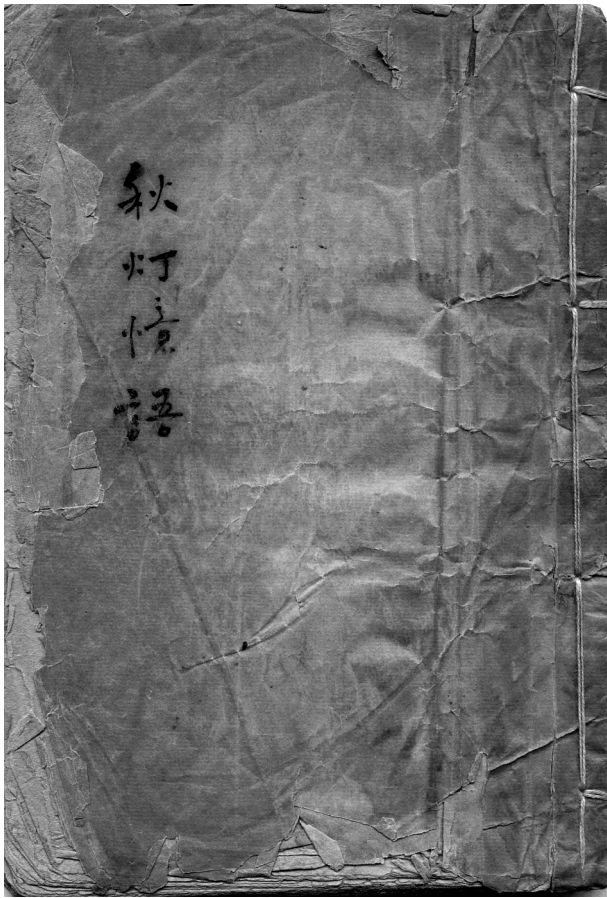
等到了八十年代，一切走上正轨，在亲朋的点拨下，我猛然醒悟这本书的意义，想：“一定要找回这本书！”为了我不久前去世的父亲和已去逝多年的母亲。我四处打听，所有的长辈、亲友同样遭洗劫，像这样的“四旧”谁还敢保存？最后打听到昆明一家姓周的亲戚，名字不记得了，他说他家还有一本，世上仅存的一本。我万分感激地到昆明去拿了回来，已经很旧了。

后来，我四姑四国时带到美国去抄写。几经辗转寄回来时已经很破旧，快散架了。我的高班学友贵州作家书法家戴明贤先生受书如命。他借去后细心加上封面，亲用手用针线缝合，写上书名。在他的引荐下，热心肠的小妹引以结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丽，看稿后答应帮忙出版。在我耄之年终于得以见到

该书面世。甚幸！也聊以慰藉二老在天之灵了。

在此之前,《香港笔荟》在小妹的努力奔走下也曾连载过四期。感谢所有帮助、支持过我们的人,尤其是戴明贤老先生。他豁达大度、平易近人、有求必应,我和我的妹妹们都感念在心。

很老的“小以靖”



秋灯憶語

秋灯忆语

宗和战时履迹(1936—1945)

北平—青岛—苏州—南京—合肥—汉口—长沙—桃源—广  
州—柳州—贵阳—重庆—昆明—宣威—呈贡—宣威—昆明—昭  
通—昆明—重庆—成都—西齐—洛阳—界首—六齐—张老圩—  
张新圩—里煌

凤竹死已将近五个月了，因为死在乡下，没有发讣文，也不曾为她写行述行状一类的文字，可是我心里老想写一篇文章纪念她。到立煌古碑冲之后，一切较安定，课后闲暇无事，在水声风声雨声中的灯下，翻看旧时信件和日记，颇多感触，信笔写来，断断续续不成篇幅，写时我极力压制自己，想用平淡的笔，第三者的态度来追述过去的事。写好一段总拿给赵景深先生看。后来我

们谈到题目，他说冒辟疆有《影梅庵忆语》，可以仿照一下，就叫《秋灯忆语》吧。我也很同意这个题目，不过冒记的是他的爱姬，而凤竹是我的妻子，不知她在地下会不会对这个题目生气。写时并不预备发表，只想等战后，好好地印几百份，附上凤竹的照片、日记和信札，送送熟人，作为纪念，所以文字中所提到的人，全是真名，现在在这儿发表，还要请各位先生原谅。

1944.11.20.夜

秋燈隱語

張宗和著

给凤竹（代序）

凤竹：

我们分别整整有一年多了。我总不以为你已经死了，还像在云南时那样，你在呈贡，我在宣威，你在昭通，我在昆明，不过我们在一起七年，这一次的分别最长了。

我好像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你最关心的自然是我和小以靖。好，现在就从我和小以靖说起。这一年来我们都很好，我在立煌住了一年，一直没有生过病，除了最近身上有点疮，叫人心里发烦，但疮现在也快好了，以为生疮，人瘦了点，这正是你所乐意的，你不是总觉得我应该瘦一点才好吗？

今年暑假我回圩子一趟，住了一个多月，见到小以靖，她从床上跌下来，把腿跌坏了（你一定要骂我了吧），走路一歪一歪的，是靠五婶妈天天拿药给她敷，现在也好了。我回家去，她脸正在生暑痘子，一脸的包难看极了，一直到我再回立煌之前，她脸上的暑痘子才好，脸也漂亮了。你以前担心她的肚子大，像我一样，怪难看的，现在却不然，她的身段也苗条了，将来长大了，一定会和你一样漂亮，你放心好了。她现在在新圩子跟五婶妈，乖得很，五婶妈很会照应孩子。等暑假我们回来，再带她到上海去见见她的舅舅舅妈们。

关于《秋灯忆语》，在快要出版了。你看了也许会哭，也许会生气。以前你在我日记上看到我写你们在广州的情形，你不是哭了吗？现在我写我们在成都上坟，你也许还会哭。至于生气，一定有许多地方会惹你生气的，譬如写你们家窘的情形和一些闺房密事。大老姑嫜和她们都觉得太那个的地方，你一定也不愿意人知道，你一定会骂我说：“倒头的张宗和，尽写些丑事，好的他全不说。本来这本书我不想在这里印，想到上海去印，后来平和大姐鼓励我，说在这儿写的，就在这儿印，也留个痕迹。我

也想快点印出来,可以送人,所以就决定在这儿印了。还有原来在《世界月刊》上发表的,有没有登完,还差最后一段。现在总算全了,印出来,也了了一桩心愿。

忽然想不出什么可写的了,愿意梦见你,吻你。

宗和 1945.9.24,立煌



## 一 北平青岛苏州南京合肥汉口

大学毕业那一年，1936年夏天同学们正忙着找事，而我却在计划怎样到青岛去玩。暑假之前我就和四姐通信要她从苏州到上海，然后再坐海船到青岛，我呢，就预备从北平坐火车到济南转青岛。我打听青岛的旅馆很贵，如果住一个暑假一定要找一个住处。于是我找到一个研究院同学许宝禄君，他有一位亲戚在青岛有座别墅，请他写了一封信给那位管理别墅的管事先生。一放假我就同一位山东同学刁集亭一同乘车经济南转赴青岛。

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青岛，一个熟人也没有，也都是才踏出学校门的，对什么都很嫩。一下车就上了当，太平路就在车站边上，而我们却花了不少钱坐洋车才找到刘氏静寄庐。管事先生已经不是许君知道的那一位了，换了一位张先生，我们怕他不招待我们，因为我们这两位客人太转弯了，是他们主人亲戚的朋友，他要不招待我们，我们只好去找旅馆。还好，他没有不容纳我们的意思，但看样子也不见得欢迎，一直到下午，他才指定我们一间房，我们才到车站把行李取了来。

好像是第二天，我们在码头很顺利地就接到了从上海来的四姐<sup>①</sup>，她住在我们隔壁，有了三个人，我们这避暑团就热闹一点了。

---

<sup>①</sup> 即——张充和。

四姐是个曲迷，在上海时就打听到以前替我们拍曲子的沈传芷也在青岛替人拍曲，且抄得有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别墅里也有电话，我们马上打了个电话找他，他果然马上就赶来了，于是我们就谈到青岛曲界的情形，他告诉我们路秘书是唱冠生的，孙主任是唱老旦的，某科长唱得最不好，路小姐孙小姐是初学，但全唱得好，又说他们听到曲友来了，自然马上会来接你们的。说着说着他有拍期就走了。

果然，到晚上，有路秘书的汽车来接我们了，同学刁君虽然不会唱昆曲，也跟了我们去凑热闹。四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坐在汽车上都好笑，一个人也不认得，糊糊涂涂地就去赶人家的曲会，假如这辆汽车不是路家派来的，我们不是都要被绑去了吗？车子在一所小洋房前停了下来，传芷先出来接我们，也只有他和我们熟。一间大客厅坐满了人，全都穿得很考究。路家是主人，自然他家的人最多，而会唱曲子的人也多，路秘书自己不用说是老曲家，老太太也不反对，且喜听曲子，少爷路仲宽夫妇也会唱，小孙女凤兮才七八岁也会唱《小春香》，路家三，四，五，六四位小姐都会唱，此外孙家父女连我们一房也有十几个人了。

因为全都陌生，而且女客多，使我有些窘，我只好和老秘书谈话，原来老秘书是贵州人，老住在四川，知道我们祖父，祖父曾经在前清时做过一任川东道，老秘书说他德政很好，使我感到光荣，我虽然没有见过我的祖父，但常听人说起，父亲八岁时，祖父就逝世了。

我们觉得他们的曲会还不够正式，因为大家都还唱清曲，也不嵌白，有的还要带铺盖。因为我们在苏州所参加的大曲会都不看本子的。但我们总留心听别人唱。我们唱完了，他们也拍手。他们招待得很好，大客厅也叫人非常舒适。四姐和那些小姐们不久也就熟了。夜已很深了，他们才又用车子送我们回

静寄庐。

睡觉之前，我和四姐自然在批评他们，四姐说孙小姐不错，唱也唱得好，人虽不十分漂亮，却很(Charming, 妩媚)我也同意她这句话。我们还谈到她牙齿太稀，缝太大，年纪仿佛在许多人中也最小，不打扮，短头发，是个中学生的样子。

此后我们在青岛反是到海水浴场的时间少，而唱曲子的时候多了。同学习君因为职业关系，又到济南去了，只剩我们姐弟二人。我们游过崂山，青岛又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湛山汇泉我们都常去，我记得下水一共不过五六次，孙小姐游得很好，她教我们，我们也都勉强会了。我的姿势最不好，他们说我是狗划水。孙老伯最好玩，穿了游泳衣，套了救命圈，在海水浴场两头走，也算是游水。沙滩上的确很好玩，可以做种种游戏，我常常把身体埋在沙里，在海边的人，都晒得很黑，就是我一个人白，身体又肥，一点也不好看。孙小姐有一次说，她的同学问她，你那位朋友怎么那么白？在海水浴场，白是一件丢人的事。她的身体倒是不错，黑黑的，圆圆的，丰润而不肥壮，很玲珑。可惜她那件游泳衣太大了点，一沾上水更松，常常背心会掉下来，露出小部分丰满的胸部来，我常叫四姐替她挂好，但有时她游得正上劲，却讨厌人去惹她。而海水浴场就很少有这种伤风化的思想，我们太顽固了。

每次曲会总有人请客，我们吃了人家不少顿，很不好意思，于是我们也请人一顿，一切请孙老伯办理，因为他是曲会里的总务主任，常常贴钱，而事总办得十分令人满意。所以我们这次请客，也请他主办。地点就在他家客厅里。他家的客厅很大，长长的玻璃门，很透气。那晚上的酒席也非常丰盛，我不能吃酒，孙小姐在我玻璃杯中倒上很多汽水，一小点啤酒，别人都暗笑她帮我忙。在青岛短短的一个月中，我和孙小姐见面最多不过十次，

她也到我们住处来过几次，但总是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多。我们一同看过电影，吃过小馆子，在海边散过步。虽然是暑假，但她们（圣功女学里）还有什么劳动服务，日里总不很有空。四姐已和她很熟了，而且很要好，她告诉我们，第一次见我们印象很不好，尤其是四姐，她还擦了口红，而事先传芷又说我们刚从上海唱了戏来，她们还以为我们是戏子，及至四姐唱完了，大家拍手，她又站起来拱拱手，这一点她们的印象最坏了。心想到底是戏子，怎么女人还拱手。其实苏州唱曲子的老规矩，大家都拱手，也不以为怪了。她告诉我们，我们都很好笑。一个月中我对她已很注意，觉得她活泼，大方，聪明，有趣，会说话。我还曾经很冒昧地问她几岁，她也答我才十七岁。真还是小孩子呢。以为我对她还好，四姐便常常开我的玩笑，她也很赞成她，但我知道她那时对我的印象，只是还不坏而已，却一点没想到要嫁我的话。

父亲从家里发来一份电报，要我赶快回到苏州去，在自己家里办的学校里（乐益女中）教书。我于是不得不走了，我没有让这一般新曲友知道，因为怕他们又要钱行。但仅仅只有孙小姐一个人知道。我第一天就买了船票，第二天一早开船，头一天晚上虽说好请她不必来送，但我心里却很想她会来送我。果然，天刚亮，她一个人便来了，我们一同坐汽车到船码头。送我上船的还有四姐（她不回去，还要在青岛住住，我真羡慕她。）和一位宋汉箴君。我们一同先上了船，是个日本船，好像叫青岛丸，很干净。快开船的时候，他们都下去了，买了三卷纸带，我站在船沿上，他们站在岸上，我和孙小姐拉的是一根紫色的，船开了，我眼睛老望着她，她也望着我，远了，纸带断了，人也看不见了，我收了三根纸带的断头，怀着十分喜悦，三分惆怅的心情进了舱。

、因为她不会化妆，四姐在教她，叫我在上海买一盒三花牌

胭脂寄去，借了这一点因头，我们开始通信。在苏州教了半年书，我们来往的信上全说的是废话，但也不知有那么多废话讲。她信写得很好，第一次有改动过的字，这表示她很细心，第二封信很叫人爱看，写得流利有趣。她告诉我说，她母亲因为看到我的信很密，于是叫她读给她听，她读完了，她母亲说：“张宗和真是没事做，尽说些没要紧的话，五分邮票白花了。”老太太当然不懂得这些废话的功用啊！

1944.11.3.晚追忆于立煌古碑冲皖院

在自己家办的乐益女中教书，总觉得不大好；一来是怕人说我找不到事，所以才在自己开的学校里教书；二来是自己就把钱拿到学校里，又由学校发给我六十元一月薪水，这太没有意思，所以决定过年之后不干了，刚好中学时的同学李宗弢在南京励志社中学教书，来信叫我去，所以过了年便到南京去教书了。后来四姐也到南京来编副刊，于是为了方便在国府路香铺营口租了一家杂货店楼上的两间房住下来。还带了四姐的张妈为我们洗衣煮饭。在南京的那半年，我好孙小姐仍然维持着通信的关系，信虽不密，但我有一封去，她总有回信来。

二十六年上学期结束之后，我们都回到苏州家里，到家的那一天正是卢沟桥事变的那一天。四姐因为应了孙老伯的邀请，于7月10号动身到青岛。她说去替我说亲去的。我本来也想去，但是当时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而家里还有许多事要做。

自七七之后，时局一天一天的紧张起来了，8月初青岛的风声很紧，我曾打电报叫四姐回来。“八·一三”事变发生，我们当天下午就在号外上见到，晚上四姐由青岛回苏州，而我们全家除了我之外，都在8月9号乘车回合肥老家了。四姐到家，当晚我们自然谈的是青岛的事，她说孙老伯孙伯母都愿意，孙小姐自己

自然也不反对，他们已经常常开玩笑，甚至于他爸爸也拿女儿开玩笑。但关于她的肺病的情形，却没有谈多少，好像她的病并不严重似的。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15号苏州第一次遭敌机轰炸，那时的人从来没有遭遇过轰炸，都非常惊慌，我们当夜就到了木渎。因为那时许多城里人都向乡下跑去躲飞机。在木渎朋友徐君家住了一天，怎么办呢？商量结果，决定在坐小船到香山，那儿有二姨三姨家在。

香山是太湖边上一个小镇，每天都有飞机从头上飞过。战事似乎大有延长下去的趋势，我们不能老住在这一小镇上，于是半月之后，我们又回到苏州，乘车回合肥老家，和家里人聚齐。

合肥城里也有飞机来了，于是又到西乡张老圩。在乡下住着，似乎很安静，我们从无线电中知道上海失守，苏州失守，南京沦陷，渐渐敌人已经在巢县附近出现了。

二十七年春天，我们又从六安乘汽车到汉口，那时励志社已改为“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我在犒赏科里当一个小职员。

在逃难之中我和孙小姐的信仍没有断。从函件中知道他们全家由青岛到了香港，在香港，九龙，广州都住过。后来知道她进了医院，才想到她的病也许相当严重。但她信上从没有提到她病重的消息，好像是在休养，没有什么大病。我们在汉口住定了，她们家也在广州住定了。

1944年11月16日听从胡嘉先生建议补记于古碑冲皖院